

明清河北科举与经济关系刍议

刘虹¹, 张森²

(1.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石家庄 050091; 2.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明清时期, 伴随着河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河北境内书院、义学等教育机构纷纷建立, 膏火、川费有了可靠保证, 士子踊跃走进考场, 博取功名, 河北科举大省形象的确立与此不无关系。在明清时期, 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河北科举事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各地区科举发展的不平衡性。

关键词: 明清; 河北; 经济发展; 科举事业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3X(2009)07-0005-07

一个地区的科举兴盛与否, 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诸如社会风俗、文化传统、经济水平等, 但最根本的因素无疑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经济发展和科举业绩的取得两者之间的联系从表面上看似乎并非那么直接和明显, 然而, 地区经济发展在科举教育事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却是不可否认的。明清两朝, 河北为畿辅重地, 借助这一特殊的地位, 其经济、文化教育和科举都有了快速发展。本文即以河北地区为一个案, 对经济发展与科举兴衰的关系作些探讨。

一、明清前中期河北经济的发展与科举大省地位的确立

(一) 明清河北经济的发展与河北书院、义学的广泛修建

自明朝建立直至嘉靖年间及清朝的康乾盛世, 由于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河北人口及劳动力急剧增加,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生产技术逐步提高, 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经济的进步不仅为文化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而且也激发

了民间对发展教育的要求, 驱动了人们对发展教育的热情。

由于官学的创建维修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行为, 所以与本地的经济联系不太紧密, 而书院和义学的设置则不受行政单位的束缚, 其数量和规模容易反映出—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在明清时期, 虽然书院大多数都改由官方承办, 但在具体修建时, 很多书院都是官民合办的结果。而且通常在经济富庶地区, 民间资金在书院的修建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通过民间的助学活动, 我们也可把握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脉搏。例如, 天津书院的修建, 清代天津府城共有6所书院, 分别创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道光七年(1827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天津书院不仅在创办的时间上呈现出与天津经济繁荣昌盛同步的态势, 而且还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局面; 不仅有专为生童所设的三取、问津、辅仁书院, 还有专课举人的会文书院、不尚制艺的稽古书院以及为旅津子弟创建的集贤书院。从长远来看, 这些多样化发展的书院对开阔士子视野、

收稿日期: 2009-06-01

作者简介: 刘虹(1954-), 女, 北京人,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张森(1979-), 男, 河北沧州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史。

提高写作水平、促进文风兴盛都是十分有利的。并且,由于经费充足,这些书院一般都规模宏大,如问津书院,共有房屋 64 间,耗银 2400 两,而莲池书院修建时朝廷才拨银 1000 两,相比之下,天津修建书院的经费显得比较充裕。而会文书院在建立后,则不断向外开拓,扩大规模,买民房数处,添建房舍和藏书室。这些书院的创建和修缮主要得益于本地商人尤其是盐商的大力资助。问津书院共有房屋 64 间,其中,由长芦盐运使卢见曾和众商捐建的就有 59 间。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盐运使嵇承志重修,嘉庆六年(1801 年)众商重修。问津书院学舍经历代修葺,得以延续,教学环境不断得到改善,直到光绪前期,书院一直很兴旺。发展迅速而规模较大的天津书院,其吸纳的生员远远超过了府县官学,为众多的士子提供了求学场所,满足了士子读书应举的愿望。

书院是较高层次的教育机构,而社学、义学、私塾绝大部分都进行启蒙教育活动,尤其是义学这种办学形式,它不收学费,专门招收贫寒子弟。毫无疑问,义学创办数量的增多更能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寒子弟接受教育的均等机会。在社会动乱、人民贫困时,一般平民百姓生活尚朝不保夕,何谈入学读书。只有随着室家穰穰、景象熙熙的太平盛世的到来,才不难看到那些捐资助学的身影。如顺天府通州的“巫怪孙……雍正元年补通州州判,……分立蒙义学经义学,捐俸延师,俾州子弟夙笈肄业,造就甚众”^{[1](P871)}。遵化州丰润县的“殷和杏,贡生,刚明直谅,以古人自期尝设教于乡,贵贱贤愚,无不因材启发”^{[2](P438)}。保定府任邱县的鲍承寿,道光年间“重脩锦屏书院,延师主讲,诸生膏火备极丰厚。复创捐增义学四十余所,将捐资按里置地,勒石存案,以岁所入为束脩经费”^{[3](P85)}。再者,“舒勋字纪常,廩贡生,天性孝友……设义学,教乡党,宗族成名者甚众”^{[4](P1063)}。天津的义学更是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有到多的历程。明代,“天津义学,向不多见。贫家子弟,大率以卖糖豆为生,日赚数十文。或沿途爬草拾柴,以供炊爨,无以读书为当务之急者”。进入清代后,由于各界人士的兴学设教,天津义学随处可见。“由长芦运司设者九处……由津海关道设者十三处,由府设者两处,由县设者四处……近由天津道偕海关道两观察,又设义学四所,名之曰正本、务本、敦本、立本……凡富厚及小康之家子弟,概不收教。委系寒素,无论远近尽可送塾。观察给各童四季衣服,俾随时更换”^{[5](P45-46)}。从这些材料中我

们可以看出,这些广泛建立的义学在本地区有很大影响,为本地的贫寒子弟提供了读书的场所,也确实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有教无类的思想,起到了化民成俗的作用。这对于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养成良好的读书风气至关重要,并为地区创造科甲望邑的盛况奠定了基础。

(二) 明清河北经济的发展与河北学田、膏火、川资的大量捐赠

由于古代教育并非是国家包揽的免费教育,一个人能否接受教育主要取决于家庭的富庶程度和社会的助学行为。根据清朝康熙后期获鹿县的土地占有状况统计表明,在全县占地 60 亩以上的富农和地主仅占全县户丁数的 3.8%,而占地 30-60 亩的大体能自给的中农仅占 9.1%,二者合起来也仅占 12.9%,剩下的 87.1%的家庭都无能力单独供给子弟读书科考^{[6](P25)}。所以,社会助学是实现这些贫困子弟入学的必要条件。而河北经济的发展不仅为书院、义学的广泛修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使社会对求学的士子从学田膏火、直至川资甚至家庭生活进行全方位资助成为可能。一些人从自身经历中意识到资财的重要性,一旦他们致富后,就不遗余力地捐资助学,以解除士子的后顾之忧,使其一心向学。如天津府的“郇世澍,浙江会稽人,侨居天津,食贫励学,屡试不售,临终嘱子延本,以范文正义田事,妻陈氏备历艰辛,延本成立克承父志,教授省衣节食,置本邑后补屯田民地二顷零五十八亩五分,遵遗命输义学为诸生膏火资,有司详请旌之”^{[7](P3851)}。保定府任邱县的舒所获“设家塾,凡乡族子弟,从学者不取脩金,甚贫者且给膏火,二十余年无间”^{[4](1064)}。

随着河北经济的发展,河北的民众捐资出现了新的趋向,捐银捐钱的事例逐渐多起来。如在明朝,还经常见到“州人冯铨捐置稻田四顷三十二亩,岁收租银二百一十六两”^{[8](P2187)}的捐田捐地的记载。到清朝中后期,却经常见到“生员吴锡龄、监生宋朝樑又筹捐京钱二千五百余缗,发商生息,作为生童膏火之需”^{[9](P172)};“咸丰八年,本州绅士共捐制钱一千二百串,曲阳绅士捐制钱一千八百串,共制钱三千串,整发给当商,按常年九厘行息,于二八月两次交纳官库,以备书院随时具领支发生息膏火”^{[10](P52)}的捐钱事例。这反映出河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书院依靠的对象也逐渐由过去的农村士绅转向城市工商业主,这在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如天津地区,其辅仁书院拨长芦运库款发质库生息,每

年息钱半数作为书院经费;稽古书院从洋行经纪赢余项下岁拨津钱 1200 串作为书院费用;集贤书院专收外地官、商子弟,经费自然由其筹集。

一些书院有时会根据物价的上涨幅度,增加士子膏火的补助,与其他书院靠齐。例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重修三取书院,加生童膏奖,一如问津,士人德之”^{[11](P3221)}。同时,有些书院、义学尽量筹款,扩大资助范围,使所有士子都受益。如顺天府“蓟州书院经费,旧有清池庄等处田亩,其租项所入,遭丰稔则尚敷用,遭荒歉恒苦不支”。平时膏火无多,尚不足以鼓励寒峻。后来邑人许有泰慷慨“捐银二千两,为邑书院经费。”董事以其所捐书院经费,“置房屋二十一所,地十七顷,计租项岁可得东钱二千三百二十余千之数,从此议加膏火,经费既充,生童无不欢欣鼓舞”^{[8](P2203-2204)}。

明清时期,乡试、会试全集中于京城,虽说河北地处畿辅,士子距离考试地点距离较近,但即使如此,乡试、会试的旅食之费、试卷之资及考中后的种种应酬开销,也为一般贫寒士子所不能承受。为此,一些书院为使士子能够顺利的参加科举考试,还特别作了规定。如顺天府昌平州的燕平书院章程中规定:“每年除正、腊两月不课外,按十个月发给膏火,如遇乡试给予两个月膏火,院试给予一个月膏火,会试照乡试例给予。”^{[12](P375)}定州规定:“筹款捐备书院,诸生乡试之用,共银五百两,发给当商按常年九厘行息,息银均于年终一次交纳库存,以俟乡试之年汇总,由书院监院领出,按乡试名次给发此项生息。”^{[10](P55)}为彻底解除士子参加科考所需费用的后顾之忧,一些地方还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对士子进行资助。例如,遵化州丰润县的状元会,乾隆年间由邑人郑激倡捐,把置产所生滋息,做如下分派:“春闱三金,秋闱二金,作为试卷之资,获售者十倍其数。备载条款,出入勾稽,期于永远。”^{[21](P445)}希望丰润县文风丕振,科名甲于冀东。河北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使得人们更加重视教育的作用,士绅和富商对学田、膏火、川资的踊跃捐赠,使得贫寒子弟获得了有效的外在支持,完成了一个弱势家庭无法完成的事情,这不仅体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而且为更多处境不利的士子获取功名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河北经济、教育、科举的一体共荣与河北科举大省地位的确立

明清时期,河北由于位于畿辅地区,乡试配额较多,所以,河北科举大省地位的形成容易被人认为是政策扶持的结果。其实,政策扶持只是一个重要的

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社会因素需要考虑,而经济则作为一个潜在而又有推动作用的因素应该得到显现。明代河北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逐渐发展起来,其影响也在全国逐渐扩大。到明朝中期,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各省实征地亩棉花绒的数额:山东省 52449 斤,河南省 342 斤,陕西省 17172 斤,四川省 72851 斤,北直隶 103749 斤,共计 246563 斤,而河北(直隶)占总额的 40%,名列首位^{[13](P376)}。河北经济比重的提高,为以后的人才培养营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办学中的经济困难也由地方人士募集解决。河北的书院建设由明初的一两所上升到嘉靖年间的 25 所,河北境内读书习礼风气日渐浓厚,科举人才辈出,进士数量所占全国的比例也由明初的 3.2% 上升到 9.4%。在嘉靖时期,河北进士在全国所占比例高达 12.0%。

清代河北的农业生产也有了显著发展,顺治十八年(1661),直隶省田赋银 182 万余两,居全国第六位,康熙二十四年(1685)田赋银也是 182 万余两,但居全国第二位;雍正二年(1724年),田赋银 208 万余两,居全国第六位;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田赋银为 244 万余两,居全国第五位。虽然仅以此项来考察某省的经济水平有失偏颇,但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农业上交的田赋银无疑是衡量某省经济一个重要的指标,清代河北田赋银排名相对于明代的更加靠前,表明河北经济实力和地位的增强。稳定持续发展的河北经济为河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伴随着河北经济的增长,河北书院的数量也从顺治朝的 4 所增到康熙朝的 16 所,再到雍正的 6 所,直至乾隆时期的最高达 65 所^{[14](P412)},承其余韵直到道光年间河北书院数量一直都很多。在经济繁荣、文风浓厚、书院林立的气氛中,清代河北科举较明代也有了更大的发展。明朝 24866 名进士,河北 2289 名进士,占全国总数的 9.2%;而在清朝共取进士 26391 名,河北则为 2666 名,占 10.2%,仅次于浙江和江苏,在全国省份位居第三名,成为了科举大省。

二、明清两朝末年河北经济的衰退及其对河北科举的影响

明代河北农业的发展,其成绩在明前期、中期是比较突出的,不论抗洪排涝工程,还是井泉灌溉开发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到了明万历年间,国家政治衰象显现,政事日坏,吏治腐败,农田水利的修筑势头逐渐减弱,加上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许多地方

“风沙时作”、“河底扬尘”,农业生产难以抗御日益严重的旱涝蝗灾。这时,商业的发展也由于商税征收的失控,而逐渐萎缩。明万历后期,为同后金作战,政府加派“辽饷”,即每亩加派田赋银三厘五毫,以此弥补巨额兵费的不足。为镇压人民起义又加征“剿饷”、“练饷”。按一条鞭法规定,各项差役已随田赋一并征收,但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差役不断增多。天启元年(1621年),兵科给事中蔡思充说:“顺、永、保、河四郡拥护神京,称根本重地,自辽左发难以来,援兵之蹂躏,车牛之科役,笞肉捶肩,劳费视加派数倍。北方无水田,一片干土,收成甚薄,每亩加派九厘,已叹不堪。”^{[151](P347)} 由于经济的凋敝、财源的枯竭,准备战争的费用竟然伸向学校。密云县学虽然有学田一十八顷。但到万历十四年,由于借充兵饷,“廩饩遂废”^{[81](P2157)}。于此同时,河北的科举也出现不景气的现象。从隆庆时期至明朝末年,为河北科举下降阶段。这一阶段全国共取进士8844名,其中河北为683名,占7.7%,明显低于明代河北所占全国比例的最高值12.0%,同时也不如宣德、天顺年间的9.4%。明末崇祯朝,河北科举情况更糟,仅占7.2%,远远低于明代河北所占全国平均比例数的9.2%。

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清朝由盛而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大开,外国的经济掠夺逐渐加剧,尤其是天津开埠后,外国棉纺织品输入天津的数量日益增加,土纱土布费工费时且相对粗劣,无法与成本相对低廉的洋纱洋布在市场上竞争,洋布逐渐占领了大部分直隶土布市场,使直隶一些地方的手工织布业备受打击,河北大批农民纷纷破产。正如吴汝纶所描绘道:“畿辅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尽夺吾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自外国,故利入益微。”在深州,“往时棉布流行塞外。近则英、美、日本各国之布用机器制造者,幅宽而价廉,吾国布利尽为兼并,种棉之地日少”^{[161](P1556)}。高阳县也有“外国布匹输入,土布销路渐被侵夺,织业大受打击”^{[171](P412)}的记载。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对教育发展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咸丰三年,发逆窜扰深州县城,戒严设局办团,经费不支,暂将书院公项挪用,至今十余年来兵荒交困,尚未议及捐补焉”^{[111](P172)}。“近来教匪猖狂,赵、魏、深、冀间,烽烟四起。无论通都大邑,书院之毁于兵火者,比比皆是。即规模犹在,亦仅为屯军粮、贮器械之地,而取其养士之费以养兵,彼都人士,莫不父子兄弟逼处锋镝之中,执干戈以卫乡里”^{[101](P2201)}。

清末,河北在经济、文化教育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河北科举更是跌落到最低点。晚清最后三朝共举24科考试,共取进士6764名,其中河北504名,仅占7.5%,大大低于平均水平的10.2%,每科平均只有进士21人,低于清代河北每科平均数的24人。这是科举史上最后的五十多年,也是河北进士的低谷时期。咸丰年间共取进士1096名,河北94名,占8.6%;同治年间共取进士1589名,河北为136名,占8.6%;而到光绪朝取进士4079名,河北274名,只占6.7%。河北科举虽然在两个王朝末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但由于时间较短,并没有动摇其科举大省的地位,河北士子在考场上仍有着很强的竞争实力,同治朝的探花张之洞和末科状元刘春霖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明清河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各地科举发展的不均衡

明清时期,河北各府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西南和东北、关内和关外、运河两岸和内地山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而各地在书院修建、士子资助方面也存有差异。那些农业发展较好,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就比较迅速,城镇的密集程度就高,商品经济比较繁荣,从而对文化教育的需求和投资热情也较为高涨,因而文化教育也较为发达。如位于白洋淀附近河间府的任邱县水源较为丰富,粮食产量较高,牧、林、副、渔各业都有很大发展。“其地为九十九淀之所,总汇堤堰陂塘洋泊之属,动以数十百计,或经或纬,一纵一横,旱乾则为膏腴,水溢则为渊薮”^{[41](P174)}。再如文安县,是河流汇集之地,繁华的集镇很多。“文邑市廛惟胜芳为最盛:水则帆墙林立,路则车马喧阗,百货杂陈,商贾云集,故列为直隶六镇之一。其次则苏桥,北枕清河,与霸县接壤,西通西镇,南控大洼各村,颇得交通地势。左各庄一镇,居南北往来要冲,商业亦日见发达”^{[181](P57)}。而明清两朝这两县的进士数量都很多,分别为107名和60名,属于科举大县行列。这种地位的取得与本县经济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与这些地区相反,那些比较贫困的地方,由于处于山区丘陵地带,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农业、商业经济发展缓慢,集镇难以形成。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总是处于落后状态。“走真定迤西为井陘,路在山谷中,两崖相夹,大都似函谷关,而狭隘过之,所谓车不得方轨,马不得成列”^{[191](P225)}。无极县,土

壤沙瘠,可耕地仅占十分之一二,其余全被沙压。又如广宗县“环百里内非直无培塿之山畎,涘之水且多沙不能厚植,又不可以井,曠则乾枯,滞则淹没,人复椎不能经营四方,此其穷困所繇(由)也”^{[201](P97)}。市集上“然所贸易皆惟菽粟、布帛、牲畜、器物,无四方商货也”^{[201](P62)}。

由于缺少资金的投入,这些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极为不利。如顺天府房山县“征敛冗杂,力役繁兴,民之疲于输作者,较他邑为甚,以故学舍圯敝,然吏当力有所屈,欲葺之而有所不暇也。”^{[81](P2161)}以致造成“可造者有人,就学者无地”的境地。顺天府怀柔县学也出现“往者常议修学,不果,而讲堂岁久倾圮”^{[81](P2161)}的情况。顺德府广宗县“社学十五所,年久圯废。惟在城板,台者存协,近修葺三周者,群乡之子弟诵读于中,余当次第修举而未之逮也”^{[201](P56)}。出现“今庠序稀絃诵之声,里社多湮废之址”^{[201](P57)}的局面。教育经费如此捉襟见肘,教师的待遇可想而知。正定府井陘县为小县,“学宫年俸为白银40两,待遇亦极菲薄。雍正间仅为31两5钱2分”^{[211](P25)}。难怪井陘人面对本地科举不佳的状况有“然不如获邑之就范,意者山川之气尚郁而未开欤?抑或井人贫而获人富,师承固殊欤”的猜测^{[221](P1126)}。

不但学校教育不足承担育才之责,就连考生的川资也不能资助。房山县“李张瑞……弱冠以太学生应乡试,运不得志,迫于家境,历充外任西席及教授本地生徒,善诱人,多成就。年四十余中清光绪丁酉科举人,翌年会试借闹河南,以资匱不得赴试”^{[231](P559)}。由于缺少旅费,很多举人都不再进一步博取进士功名,而是匆忙选择务实的出路,维持生计。例如,“邱秉哲,字月亭,道光甲辰乡荐,咸丰癸丑大挑一等,该就教职候选”^{[231](P552)}。“王言字论阁,道光戊子科乡荐,乙未大挑一等,任山东等县知县,均有政声”^{[231](P552)}。举人不再应考,自然影响到进士的数量,房山在明代有4名进士,清代仅有2名,与此不无关系。

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区的差距上,而且也可在一个地区前后经济发展上得到深刻体现。有些地区原来是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后来由于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的频繁,从而使得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如大名府,由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以后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咸丰五年六月铜板厢口河决溢入州境,州南数百村田庐人畜皆被漂没,至今仍未入故道,尚受其

害”^{[241](P185)}。这种情况在东明县也得到体现,“明邑学宫,旧制宏敞壮丽,甲于诸邑……自戊子一毁于兵,庚寅再湮于水,数十年来,虽间有修葺,而废略未备者多矣”^{[251](P170)}!以文化教育发达著称的大名府,在咸丰、同治两朝竟无一人进士及第,在之前的嘉庆和道光两朝总共才有2名进士,在之后的光绪朝也仅有3名进士,也就是说,从嘉庆到科举废除的110年间,大名府仅有5名进士。这充分说明自然环境的恶化给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四、明清河北经济对科举的影响及其特点

明清河北经济对科举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省来讲,由于其地处畿辅重地,因而具有不少颇为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商业的迅速兴起改变了明清河北科举人才分布的格局

清代天津地区的经济与明代相比有了飞速的发展,成为河北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当时,南方闽广的糖、茶、海货、木材,江浙的丝绸、布匹,江西的瓷器,江南的竹木制品等都沿运河于天津集散;北方的棉花也通过天津南下,这里成了各地商贾往来的交通要地。天津发达的商业经济,培养了众多的鸿商巨贾,他们不仅取得商籍和灶籍的科举特定名额,而且还积极出资捐款,在天津大兴土木,兴办文化教育和多种公益事业,改变了天津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在清朝,河北共有举人10939名,而天津府就有1498名,占13.7%,超过了省府所在地保定府的1329名,仅次于顺天府,位居全省第二位,改变了明代保定府稳居第二的局面,相比于其在明朝的322名举人,更是超出很多。据《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一书记载,天津在雍正时期已完成由军事重镇向工商城市的转化,到乾隆时期其发展达到顶峰。这一结论也可在天津府举人及第数量中得到体现。天津府在康熙朝举人为138名,与顺天府的486名和保定府的347名相差很远,但到了雍正朝其举人为97名,和保定府的118名相差就不多了。到乾隆时期其拥有举人415名^{[261](P456)},超过了顺天府和保定府,一跃成为第一。天津科举由明代的不景气发展到后来“津门得举孝廉者,每科不下二十名”的盛况。可以说,正是天津地区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雄厚物质基础,对这一地区的文化与教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出现了天津科举及第数量的突飞猛进、后来居上的态势。

(二)传统的“耕读思想”依然占有强大的市场,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阶层

虽然河北某些地区商业的迅速发展改变科举人才的布局,但更应看到的是,这只是河北商业发达地区的诱人景象。在河北内地广大地区,依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耕读思想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人们意识到要生存,只有勤于耕稼;要发展,只有读书仕进。这种耕读为业、学优则仕的观念依然牢不可破。如保定府的清苑县,“民俗务本不尚末,作不能商贩远方且耻为胥吏,故邑中富室绝少,其衣食稍足者皆令子弟向学,虽穷乡下里必有塾师,絃诵之声达于四境”^{[27](P308)}。只要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河北农家都送子弟入学读书,走读书入仕之路。不仅农家子弟如此,就是富甲一方的商人也把科举应试作为他们的首选目标。例如,天津的大盐商查日乾,其子查为仁,于康熙五十年举乡试第一。其孙善长,乾隆十八年举人,联捷进士。另一孙善和,善居积,重振家业,学问博雅,著有东轩诗草集。善和子诚,乾隆四十二年举人,官员外郎,积书满架,无不批览,然不事生产,家又中落,著有天游阁诗稿^[28]。天津查氏最终实现了由盐商之家向书香之家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家业衰落的后果。由此可见,官商结合虽不利于商业进一步独立发展的一面,但由于终极目标的一致,在耕读基础上产生的以贾代耕的曲线回归思想和致富助学的行为,使以耕读为业的士子得到外界强有力的心理和物质支援。农家子弟及工商子弟的大量涌入,从而促进了河北科举阵容的日益庞大与强盛。

(三)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政策照顾,使得河北科举人才的地区分布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

在明清直隶省,其长城一线内外的承德、宣化、永平等府由于开发较晚,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但随着承德府的设立和避暑山庄的修建,口外的承德地区由昔日龙沙雁碛之地,变为筑场纳稼、烟火相望的富饶之地,以致出现“余粮栖亩畔,滞穗

乐丰年”亘古未有的盛况^{[29](P1194)}。而宣化地区,入清后,由于民族关系缓和,宣化府的农业、商业发展也较为快速。“菽麦禾稻熟作食”,“岁晚先计公租,纳后市其余,易布棉”。“城内“贾肆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纱缎铺、苏杭绫罗铺之类,延长四五里”^{[30](P583)}。此外,遵化州和永平府在清代也都得到很好的开发。

经济的欣欣向荣,促进了向学之风的形成。如承德府的“钱守礼……于乡从者恒百余人,远近知其名”。后来“从游愈众生徒五百人”^{[29](P932)}。于士璋,平泉人,“寻于宅旁构数楹,见逢掖之士必殷勤款延,助之膏苏,并为择师课其学,有应试者,厚其馈贖”^{[29](P937)}。再如,丰润县的“韩斗耀,邑庠生,秉性慷慨,重义轻财……延师课子弟,兼成孤寒之士若干人”^{[2](P440)}。经过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及“著加恩照宣化府之制,另编承字号每科乡试取中举人一名”的优待,清代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科举成绩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例如,承德的科举实现了零的突破,举人达到135名之多;宣化府、广平府、遵化州的举人分别从明代的192名、99名、326名增到清代的370、300、820名左右^{[26](P456)}。虽然与处于河北中南部科举发达的府县相比还有一些差距,但由于长期经济文化教育积累和政策照顾,这种差距呈现出一种缩小的趋势。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河北经济的发展对教育发展、人才培养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河北举人进士的分布变化显示出其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基本吻合的变化趋势。通常某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科举业绩提升也快;某一地区的经济越发达,科举成绩越是显赫。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制约文化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也制约着人才选拔制度实施与发展。可以说,经济与科举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工业化之前的经济与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清]高建勋.通州志[M].台北:学生书局出版,1968.

[2] 牛昶煦.丰润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3] 瞿光缙.续任邱县志(卷上)[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4] 刘统.任丘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5] [清]张焘.津门杂记(上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6] 史志宏.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 沈家本.天津府志(卷四十三)[M].天津:学生书局印行,1985.

[8] 周家楣.顺天府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9] 韩志超.蠡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10] 王榕吉.定州续志(卷一)[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11] 沈家本.重修天津府志(卷四十)[M].天津:学生书局印行,1985.

[12] 缪荃孙.昌平州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 [13] 孟繁清. 河北经济史(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 [14] 阎国华. 河北教育史(第一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15] 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 明熹宗实录(卷七)[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 1962.
- [16] 吴汝纶. 深州风土记(卷二十一)[M]. 台北:学生书局, 1968.
- [17]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18] 李兰增等纂. 文安县志译注(卷之一)[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 [19] [明]张瀚. 松窗梦语(卷之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0] 马协. 广宗县志[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0.
- [21] 崔治先. 井陘县教育志[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 [22] 郑大进. 正定府志(卷十一)[M]. 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1968.
- [23] 高书官. 房山县志(卷之六)[M].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8.
- [24] 陈兆麟. 开州志(卷之二)[M].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
- [25] 储元升. 东明县志(卷之二)[M].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
- [26] 刘虹. 河北科举浅谈[A]. 刘海峰. 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C].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2006.
- [27] 金良骥. 清苑县志(卷四)[M]. 台北:成文出版社, 民国 23 年印.
- [28] 新凌雯. 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一)[M]. 民国 20 年(1931 年)刻本.
- [29] [清]海忠修. 承德府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7.
- [30] 吴延华. 察哈尔宣化府志(卷二十三)[M].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8.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economics of Hebei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U Hong¹, ZHANG Sen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 During Ming and Qing, academies, school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pring up as the economy is restored in Hebei, which enables candidates to go to take the tests. This helps with the fame of Hebei province. However, at the end of the two dynasti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the economy slides to deterioration, resulting in an imbalance in various regions.

Key words : Ming and Qing; Hebei;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erial examination

[责任编辑 范玉凤]